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口述与案头

林岗 著

Koushu Yu Antou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丛书

口述与案头

Koushu Yu Antou

林岗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口述与案头/林岗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7

(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ISBN 978-7-301-18954-2

I. ①口… II. ①林… III. ①中国文学-古典文学研究 IV. ①I206.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099845 号

书 名: 口述与案头

著作责任者: 林 岗 著

责任编辑: 徐丹丽

封面设计: 奇文云海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8954-2/I·2345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编辑部 62752022

出版部 62754962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印刷者: 世界知识印刷厂

经销者: 新华书店

965 毫米×1300 毫米 16 开本 15.5 印张 215 千字

2011 年 7 月第 1 版 2011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30.00 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010-62752024 电子邮箱:fd@pup.pku.edu.cn

总 序

在中国著名的综合性大学中,中国古代文学这个传统学科都堪称历史悠久、积淀深厚。中山大学的古代文学学科也不例外——她的历史与孙中山先生所创立的中山大学(初名广东大学)同样悠久。鲁迅、郭沫若、陈中凡、方孝岳、容庚、商承祚、詹安泰、董每戡、王起等名字让我们回忆起来充满着自豪感。

然而,对后人来说,学科辉煌的历史与丰富的遗产同时也是压力。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固然占了“便宜”,但也像是站在海拔极高之处,每一步攀升都异常艰难。仰望前辈,如何既继承学术传统又有所发展,是我们一直思考的问题。

当今,“独创”二字已经成为各个社会阶层的流行语。不过,各个领域不同,不同学科有异:有些贵在创造发明,有些偏重发掘发现。有些可能是“独创”,有些则只能是“独特”。对于人文学者来说,我们似乎难以以创造发明自诩;形态上的“新”与“旧”也难以用来判断学术价值的高下。所谓“创新”,未必意味着对于传统的抛弃。按照清代学者纪昀评点《文心雕龙》的说法,在历代文坛上,“新声”可能成为“滥调”,“旧式”也可能成为“新声”。新与旧不是绝对的,是会互相转化的。在传统断裂的时代,挖掘与发现传统文化资源,也是颇有价值的事。

在中国文学批评史中,文体学就是传统的学术资源。“以文体为先”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与文学创作的传统与原则。中国文体学成熟相当早,《文心雕龙》在文体学方面已经相当精深而自有体系,此后的文体学可谓久盛不衰。但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文体学日益式微,甚至被人所淡忘。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新的学术观念推动下,文体学研究成为

古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之一。近年来,文体学研究更是越来越受到中国文学学术界的重视,成为一个极具研究价值的前沿学术领域和备受关注的学术热点。

尊重古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回到文体的历史语境,将文学观念和理论建筑在具体文学史实之上,以中国“文章学”的观念来“发现”、诠释和演绎中国文学自己的历史,尽可能消解自新文化运动以来套用西文学分类法研究中国传统文学造成的流弊——这是近年来中国文学研究源于自身需要与反思所形成的重要发展趋势,也是中国文体学兴盛的背景。这一兴盛具有丰富的学术史意义,它标志着古代文学学术界的两个回归:一个是对中国本土文学理论传统的回归;一个是对古代文学本体的回归。

回归本土与本体,并不意味着满足于回归到“旧式”那里去。我们强调回归到中国文化与文学的原始语境与内在脉络,同时又不能也不可能排除现代意识。西哲曾云:“人不可能两次踏进同一条河流。”虽然,中国文体学之复兴,为“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种作为“新声”的“旧式”已经完全不可能与古代的文体学相同。我们要站在21世纪的学术高度来研究中国文体学,回到中国文体的历史语境,但又不仅仅是要回到刘勰等古人的理论,同时必须具有当代的学术意识,反映出当代的学术眼光、学术水平与境界。

作为国家级重点学科,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必须有自己鲜明的特色,有受到学界认可的学科方向。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就是近年来我们凝聚力量、重点建设的研究方向。经过多年的努力,它已经成为本学科影响最大的方向之一。同仁们在古代文体学研究方面成果丰硕,除了发表了大量论文之外,还撰写了不少专著,同时,也承担了一系列国家级和省部级科研项目,尤其是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古代文体学发展史”,为了及时反映这些研究成果,我们组织出版这套“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丛书。

本丛书是开放与持续的。作者除了中山大学古代文学学科的教师，还有其他高校教师与学界同仁。所收成果以中国文体学研究为重点，兼及相关领域的研究。我们希望能不断地吸收中国文体学研究成果到本丛书中来，共同推进中国古代文体学研究的发展。

吴承学

2010年12月于康乐园郁文堂

目 录

第一章	汉语史诗问题的回顾与评论	(1)
一	20 世纪汉语史诗问题的回顾	(2)
二	诸说的汇评	(11)
三	汉语史诗问题的根源	(20)
第二章	荷马问题、口头理论、口述与案头	(27)
一	荷马问题	(28)
二	口述传统与口头理论	(36)
三	口述与案头	(45)
第三章	各文明及其口述传统的考察	(59)
一	史诗与口述传统	(59)
二	口头活动的三种类型	(70)
三	华夏上古的口头活动	(73)
第四章	汉语史诗问题的解释	(88)
一	青铜时代与史诗	(90)
二	卜辞时代与诸神的可讲述性	(98)
三	殷周文化氛围与史诗传唱	(117)
四	歌人的地位及变迁	(130)
第五章	案头传统的起源	(136)
一	问题的提出	(136)
二	汉字与案头传统	(140)
三	卜人、史官与案头	(151)

第六章 小说家的兴起与文人的案头世界	(164)
一 西学东渐与本土小说概念的遮蔽	(164)
二 小说考	(167)
三 小说家的兴起	(172)
四 写与读的文学	(180)
五 论小说文体	(186)
六 文人的案头世界	(193)
第七章 案头之美	(203)
一 案头撰述与潜在读者	(203)
二 刻写特征与叙述情节	(210)
三 传神写照	(217)
四 传奇为笔记小说之变体	(227)
五 文笔闲雅与语含微讽	(231)
后 记	(239)

第一章

汉语史诗问题的回顾与评论

20 世纪初叶,西风东渐,西方式的文学史观念也随之传入中土,文学修史之风一时兴起。作为西方文学、哲学始祖的希腊,其文学的源头当然是它的神话、史诗。尤其是史诗,长篇铺叙,讲述本民族的神话、英雄人物和上古事迹,将想象和现实融化在宏大的叙事框架之内。史诗的题材、人物、修辞、风格以及叙事方式,都对后来的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西方文学孕育于它伟大的史诗,这应该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辩的。因此讲西方文学,一律从神话、史诗讲起,这已经成了不易的定式。

可是这一符合西方文学现象的定式作为理解文学史的背景观念被借鉴到中国,就立即出现问题:中国古代典籍并无记载有类似史诗这样的诗歌体裁,就连神话也是零碎分散存于归入史部的数部典籍和诸子的著述。何况神话获得文献典籍记载的丰富性、完整性,相对于希腊乃至北欧都是欠缺的。怎样解释这一现象呢?我们观察到,以西方的文学惯例为背景观察中国文学史而产生的解释难题,困扰了不少治中国文学史的学人。在本论中,笔者将这种困扰称为“史诗问题”。“史诗问题”随着西学东渐,简直成了一桩学术的公案,从 20 世纪初到当代,虽然不甚热烈,但一直没有停止过讨论。王国维已经意识到上古文学源头的中西差异,继而鲁迅、胡适、茅盾、陆侃如和冯沅君、郑振铎、钟敬文等学人对史诗问题提出了一些假想和论据,1950 年代之后史诗问题依然存在,饶宗颐、张松如等学人都有专论探讨。纵观过往一个世纪,但凡涉及上古文学,这个“史诗问题”似乎是绕不开的,总得提出一些假说给予安顿。无论是提出何种

理据解释这种现象,还是直接消解这个问题,史诗的困扰都成了学术关注的焦点。本论并不打算延续前辈学者的思路,为“史诗问题”提出更周详、更严密的解释,而是梳理这个持续了一个世纪的学术关注,翻检他们提出的各种解释的理据,从而检讨“史诗问题”的合理性本身。“史诗问题”要说明的无非就是文学的源头,那么我们自然要问:“史诗问题”是不是一个解说中国文学源头的合理方案?上古文学的研究长期为“史诗问题”所缠绕,背后是不是有一些与学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意识形态因素?透过梳理上古汉语文学的“史诗问题”或许可以解答上述疑问,为我们思考汉语文学的源头带来新的启示。

一 20 世纪汉语史诗问题的回顾

戊戌变法失败后,梁启超远遁日本,借鉴日本明治期间小说传播西学新知的经验,办起《新民丛报》,鼓吹“小说界革命”,西方文学以及文学史知识乘着时代风潮,渐为人知。这样,中西比较的话题,在社会和国家都陷入空前危机而亟须革新改进的情形下,自然进入公共领域。号称“近世诗界三杰”的蒋智由,大概是读过丹麦史或丹麦史导论一类的著作,对北欧神话有所了解。他 1903 年在《新民丛报》撰文,其中谈到相比北欧的中国神话,“如‘盘古开辟天地,头为山岳,肉为原野,血为河流,毛发为草木,目为日月,声为雷霆,呼吸为风云’等类,最简枯而乏崇大高秀、庄严灵异之致”^①。蒋智由的看法直观,他也没有解释何以会有如是之弱点。他所谓“简枯”云云,恐怕是说神话缺乏长篇铺叙,故事有干无枝,更乏茂叶扶持。蒋智由的看法无意中定下一个基调,即中国神话比起欧洲神话显得零碎无体,乏善足陈。结合后来学者的看法,这不能归结为个别人的偏见。

在转入考古和史学研究之前,王国维曾嗜读西方哲学和史学著作多年。如果说蒋智由的说法还不够深入,那王国维 1906 年的看法显然是经

^① 《新民丛报·谈丛》第 36 号,1903 年。署名观云。

过深思熟虑的。《文学小言》第十四则：

上之所论皆就抒情的文学言之（离骚诗词皆是）。至叙事的文学（谓叙事传、史诗、戏曲等，非谓散文也），则我国尚在幼稚之时代。元人杂剧辞则美矣，然不知描写人格为何事。至国朝之《桃花扇》则有人格矣，然他戏曲殊不称是，要之不过稍有系统之词而并失词之性质者也。以东方古文学之国而最高之文学无一足以与西欧匹者，此则后此文学家之责矣。^①

虽然王国维没有明言，但是他的中西叙事文学比较的背景是希腊史诗和诗剧，这是很明显的。蒋智由未必知道希腊史诗，而王氏看来对它十分清楚。他按照西方文学理论的惯例，将文学分为抒情和叙事两类，赞扬中国文学的抒情传统，但认为中国的叙事文学尚且“幼稚”，其叙事传、史诗以及戏曲等叙事文体，均无足以与西欧匹敌的伟大作品。

鲁迅也是在中华积弱、西学汹涌，求新声于异邦的背景下成长的。他1908年在《河南》月刊发表《破恶声论》，其中议论到欧洲神话与文学，惊叹其神话传统的伟大。他以为“欧西艺文，多蒙其泽，思想文术，赖是而庄严美妙者，不知几何”，转念而想到中国“古民神思之穷，有足愧尔”^②。作为文学源头的神话与传说，它的丰富性和复杂性，中土皆不及西欧，这种看法鲁迅倒是一以贯之。1923年鲁迅发表日后影响深远的《中国小说史略》，单辟一章讨论神话与传说。他看到神话散见于典籍，一鳞半爪，语焉不详。他说：“自古以来，终不闻有荟萃熔铸为巨制，如希腊史诗者，第用为诗文藻饰，而于小说中常见其迹象而已。”^③我们知道，神话和传说是史诗最重要的构成材料。由于没有史诗将神话和传说“荟萃熔铸为巨制”，于是它们只好成为诗文的“藻饰”和小说的“迹象”。鲁迅不但指出这种现象，还首次试图解释其原因。

① 《王国维遗书》第3册，上海书店出版社1983年版，第630页。

② 《鲁迅全集》第8卷，《集外集拾遗补编》，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0—31页。

③ 《鲁迅全集》第9卷，第21页。

中国神话之所以仅存零星者,说者谓有二故:一者华土之民,先居黄河流域,颇乏天惠,其生也勤,故重实际而黜玄想,不更能集古传而成大文。二者孔子出,以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等实用为教,不欲言鬼神,太古荒唐之说,俱为儒者所不道,故其后不特无所光大,而又有散亡。

然详按之,其故殆尤在神鬼之不别。天神地祇人鬼,古者虽若有辨,而人鬼亦得为神祇。人神淆杂,则原始信仰无由脱尽;原始信仰存则类于传说之言日出不已,而旧有者于是僵死,新出者亦更无光焰也。^①

鲁迅这两段话,一段是说别人的看法,二段是陈述自己的见解。他对别人的看法没有置评,但细寻文意,似亦略表赞同,而又嫌其未说到要害。“说者谓有二故”的“说者”,应该就是日人盐谷温。^②盐谷氏谈论中国文学史的著作1919年出版,他的著作由地理环境和儒家的观念去解释中国上古神话零碎散亡的原因。盐谷温的看法启发了后来的学者,成为广泛接受的观点。其实鲁迅只是将盐谷温的看法摆出来。他认为更合理的看法应该从民族文化传统上寻找原因。人的世界和神的世界没有截然的区别,人死为鬼,鬼可以升格为神;神又可以降而为鬼,更演变而为历史传说中的人。这样,原始的信仰在民间长久存在,新神源源不断产生,旧神的面目逐渐模糊。人神淆杂的局面使得即便是新出的神祇也缺乏严肃性,欠缺神性的神其光焰随着岁月流逝而逐渐湮灭。应该说,在那个时代,鲁迅的见解颇为独特,也很有见地。鲁迅一直坚持自己的看法,1924年他在西北大学讲学时作的《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里,他一方面采用了盐谷温的第一点说法,另外重提中国民间信仰的传统,以为环境恶劣和“易于

① 《鲁迅全集》第9卷,第21—22页。

② 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是早期日本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著作,1919年由东京大日本雄辩会出版。1920年代陈源指责鲁迅抄袭该书,鲁迅著文反驳,自认参考过盐谷温氏该著,特别是第二篇,但论点与看法全然不同,而第二篇刚好就是讨论神话与传说。事见《不是信》,收入《华盖集续编》,见《鲁迅全集》第3卷。

忘却”(指民间信仰)使得上古神话零散,没有长篇述作。^①

仔细索解,鲁迅并没有断言上古曾经存在还是根本没有存在过关于神话和传说的长编巨制。他采取了一个客观的陈述,“自古以来,未闻”有长篇史诗。因而所有关于神话零碎散亡的说法,都建立在“未闻”的基础上。但是解释活动持续造成的紧张,迟早会迫使学者采取一个断言式,就这个逐渐建构起来的“史诗问题”,给出自己的断言。《中国小说史略》发表之后五年的1928年,胡适的大著《白话文学史》出笼。他至少给出了部分清楚的判断。

故事诗(Epic)在中国起来的很迟,这是世界文学史上一个很少见的现象。要解释这个现象,却也不容易。我想,也许是中国古代民族的文学确是仅有风谣与祀神歌,而没有长篇的故事诗,也许是古代本有故事诗,而因为文字的困难,不曾有记录,故不得流传于后代;所流传的仅有短篇的抒情诗。这二说之中,我却倾向于前一说。“三百篇”中如《大雅》之《生民》,如《商颂》之《玄鸟》,都是很可以作故事诗的题目,然而终于没有故事诗出来。可见古代的中国民族是一种朴实而不富于想象力的民族。他们生在温带与寒带之间,天然的供给远没有南方民族的丰富,他们须要时时对天然奋斗,不能象热带民族那样懒洋洋地睡在棕榈树下白日见鬼,白昼做梦。——所以我们很可以说中国古代民族没有故事诗,仅有简单的祀神歌与风谣而已。^②

应该指出,没有故事诗这个事实与中国民族朴实不富想象力之间,胡适用“可见”推断两者存在前因后果的联系,其实这两者既没有逻辑的关系,也没有经验上的联系。史诗固然需要想象力,但它并不是一个民族想象力之表现的充分而且必要的条件。不能因为没有史诗,便断言民族不富

^①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9卷。鲁迅提出两点原因讨论:“太劳苦”和“易于忘却”。第一点涉及环境,第二点则属于民族性。

^②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六章《故事诗的起来》,上海新月书店1928年版。

想象力。在这个粗疏的判断中,我们看到盐谷温 and 鲁迅的影子。胡适到底说话还是有保留的。他倾向于认为上古没有叙事诗,主要指北方的情形,至于南方,他看到《离骚》中有很多神的名字,“至于这些神话是否采取故事诗的形式,这一层我们却无从考证了”^①。如果忽略表述的细节,王国维、鲁迅和胡适的关于“史诗问题”的看法,可以代表后来许多学者的意见,例如郑德坤、卫聚贤、马学良等。^②

至于胡适另一个他不经意而且没有把握的假设——本有故事诗但因文字困难不曾记录下来,就表示了“史诗问题”关注的重大转变。大约自1930年代后学者便倾向不赞同中国古来就不存在过史诗的假设,他们倾向于假设曾经存在过,但不是没有记录下来,就是散亡了。胡适虽然不倾向于这个假设,可他最早不经意表述出来。以胡适当日在学坛的地位,他的话是备受重视的。

1929年,茅盾发表当时第一部中国神话研究专著《中国神话研究ABC》。他在第一章《几个根本问题》里就批评胡适的北方不曾有丰富神话的说法,他认为不是不曾有,而是已经消歇了。“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之曾有丰富的神话,大概是无疑的(下面还要详论);问题是这些神话何以到战国时就好像歇灭了。”^③他不同意中国缺乏天惠,民生勤劳,故不善想象,以及孔子实用为教,导致神话消歇的见解。茅盾另外提出两点解释:“中国北部神话之早就消歇,一定另有原因。据我个人的意见,原因有二:一为神话的历史化,二为当时社会上没有激动全民族心灵的大事件以

① 《白话文学史》第六章《故事诗的起来》。

② 郑德坤1932年发表《山海经及其神话》,认为“《山海经》是地理式,片断式的记载,不像荷马的《史诗》或印度的《黎俱吠陀》(Rig Veda)、《加撒司》(Gathas)或希伯来人的《旧约》之美丽生动。再文艺上诚天渊之差,但在内质上,读者如能运用自己的想象力,追溯原人的想象,便可以得到《山海经》神话艺术上的真美处。”(见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上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卫聚贤1934年的文章《中国神话考古》承认,“中国的国民,因有尚功利,而且重常识的倾向,故神话终未得充分发达”(出处同上)。马学良1941年的文章《云南土民的神话》,认同鲁迅和胡适的说法,但他更赞成茅盾中国神话历史化是神话僵死最大原因的说法。(出处同上)

③ 《中国神话研究ABC》是初版书名,署名玄珠。后更名《神话研究》,见百花文艺出版社1981年版。

引诱‘时代诗人’的产生。”数年之后，茅盾撰文介绍希腊、西亚和印度史诗。文章写到末尾，他觉得读者会向他提出“国货的史诗”在哪里的问题，于是就把关于中国神话的主要论点移用到对史诗的见解。他认为中国上古是有过史诗的，例如“《汉书·艺文志》尚著录《蚩尤》二卷，也许就是一部近于史诗的东西，可惜后人的书籍上都没有提到，大概这书也是早就逸亡了”。据此看来，“我们很可以相信中国也有过一部史诗，题材是‘涿鹿之战’，主角是黄帝、蚩尤、玄女，等等，不过逸亡已久，现在连这传说的断片也只剩下很少的几条了。至于为什么会逸亡呢？我以为这和中国神话的散亡是同一的原因”。^①

茅盾的大胆假设得到了民俗学者的呼应，钟敬文 1933 年就表示：

中国的过去，因为种种的关系，在比较古老的一些文献上，仅保存了若干断片的、简略的神话和传说。一些欧洲的和东方的学者，由此便形成了一个共同的见解，认为中国文化史上没有产生过象古代希腊、罗马或北欧等那种比较有体系的或情节完整的神话和传说。这种见解的正确性，我觉得史颇可怀疑的。中国比较古老的文献上所保存的神话和传说，有着过于缺略或破碎之嫌，这是不容否认的事实。但因此断定中华民族的文化史上，必不会产生比较有体系的或情节完整的神话和传说，那光就理论上讲，也不是很通顺的吧。^②

一段已经湮灭的历史是否曾经存在某样事物，后人当然可以作肯定或否定的假设。因为不同的假设可以引发不同的陈述和推论，帮助人们认识事物。但钟敬文认为否定的假设“不通顺”，由此可见他对中国神话爱之弥深。这段话是钟敬文写给美国学者爱伯哈特的信上说的，故而用了推量语气。他不赞成中国神话本身零碎的说法，换言之中国神话所以零碎，乃是因为“散亡”。老先生耄耋之年，重提这封信，认为六十年的学术发

① 见《茅盾全集》第 30 卷，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37 页。

② 《答爱伯哈特博士谈中国神话》，见《钟敬文民间文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5 年版。

现证明他当年的看法是正确的。^①以钟氏在民俗学和神话学界的地位,他的观点成为通行的看法。一些文学史著作,论到中国神话的时候,也采取了“散亡”的说法。^②

八九十年代之后,在“没有”和“散亡”的两端,天平似乎又朝“没有”一端倾斜。饶宗颐曾提出一些理由解释汉族未见有史诗传世的原因,他倾向于“没有”:

汉民族在古代应该有他们自己的史诗。但由于古代史官记言与记事分开,记事则重时日,对于事态的描写多采取“省略”(ellipse)手段,所以没有像西方史诗的强调英雄主义。“省略”是修辞上很重要的法式。古代汉语的特征,采用省略句式见于殷代占卜文辞是非常普遍的。所以对神话人物没有作故事性的高度描写。《诗经》中雅颂的体裁久已脱离了口语,所以不是 epic 的叙述形式,因此,一般认为古代中国没有史诗。^③

在另一篇论文中饶宗颐谈论了中土没有史诗的原因:

古代中国之长篇史诗,几付阙如。其不发达之原因,据我推测,可能由于:(一)古汉语文篇造句过于简略,(二)不重事态之描写(非 Narrative)。但口头传说,民间保存仍极丰富。复因书写工具之限制及喜艺术化,刻划在甲骨上,铸造于铜器上,都重视艺术技巧,故记录文字极为简省。即施用于竹简长条上,亦不甚方便书写冗长辞句,不若闪族之使用羊皮可作巨幅,及至缣帛与纸絮发明以后,方可随意抄写长卷。^④

饶氏的所谓“应该有”恐怕是指按照世上其他文明的一般惯例,史诗演生

① 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之钟敬文《序言》。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刘大杰:《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

③ 饶宗颐:《中外史诗上天地开辟与造人神话之初步比较研究》,见马昌仪编《中国神话学文论选萃》下册。

④ 饶宗颐:《澄心论萃》,上海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在前,其他文学体裁发展在后。但是由于汉族文明特殊的原因。它的文学体裁演变脱离了一般的惯例,成为一个不遵循惯例的特例,因此“一般认为古代中国没有史诗”。

张松如显然和饶宗颐持有相近的见解,认为古代中国没有史诗。可是他们两人提出的论据完全不同。饶宗颐持论实证,一切以文献为准绳。张松如则采用马克思的亚细亚社会理论解释同一个问题。^①换言之,上古古诗不是散亡了,而是不曾存在过,这种看法在学界越来越普遍。^②

张松如的推论大致如下。按照马克思的看法,史诗和诗剧的育成“主要乃是基于城郭经济的高涨与城邦的政治民主制,是由好战与蓄奴的自由城邦生活所造成”。而中国古代社会由野蛮到文明的出现即奴隶制社会发育的夏商时期,“由于‘早熟’与‘维新’,生产力相对的低,商品生产和交换不发达,有着浓厚的公社残存,没有个体的私有经济,自由民阶层很薄弱,城市和乡村不可分离的统一,没有作为经济中心的城市”。加上精神生产的分工水平低下,“凡此一切,都说明中国的奴隶制社会是不够典型的。这就决定了中国奴隶制社会中文明的光芒还未能照透‘人神杂糅’的迷雾,而更多地保留了原生社会的模糊性与混融性”。因此它只有祭祀活动的祭歌与乐歌,如保存在《诗经》中的颂与大雅,而没有如希腊史诗和剧诗那样的诗歌体裁的产生。^③

除了倾向否定性的答案之外,我们还必须提到“史诗问题”引起的文学史解释活动的紧张还催生了另一种肯定性的意见。它们和否定的见解不同,否定的见解是通过一个否定的答案然后提供若干解释从而使“史诗问题”得到缓解,而肯定性的意见则干脆认为中国上古存在史诗,中国文

① 张松如:《史诗与剧诗》,《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这篇论文更详细的文本见张氏《中国诗歌史论》之《史诗与剧诗——兼论所谓市民诗歌》,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

② 程相占:《中国古代无史诗公案求解》,《文史哲》1996年第5期;刘俊阳:《论雅诗中的叙事诗及中国古代叙事诗与史诗之不发达》,《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4年第4期。不过,一般说来,晚近讨论史诗问题的论文无甚新意,只是重提旧论,倾向没有史诗的说法。

③ 以上引述均见张松如《史诗与剧诗》,《文学遗产》1994年第1期